

论《共产党》月刊对机会主义的批判

刘 英

(湖南工业大学 社科处,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共产党》月刊对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展开了猛烈批判,特别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张东荪基尔特社会主义。批判了他们在工人运动中背离无产阶级利益、主张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妥协的理论和实践,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捍卫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关键词]《共产党》月刊;机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

[中图分类号]D162;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6-0087-05

Criticism on Opportunism in the *Communist Party Monthly*

LIU Ying

(Social Sciences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All kinds of opportunism thought are scathingly criticiz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Monthly*, especiall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opportunism and Zhang Dongsun's Guild Socialis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deviates from the interests of proletariat in labor movement and advocates a compromise with bourgeois is criticized by the early Marxists, which is determined to safeguard Marxism proletariat revolution and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theories and meanwhile the socialism future of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Monthly*; Opportunism; Guild Socialism; proletariat revolution

建党初期,机会主义曾经给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带来重大困扰,特别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第二国际的最终瓦解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混乱,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资本主义前途,也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困扰。因此,反对机会主义成为各国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等就是反机会主义的先锋战士。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共

产党》月刊等杂志为阵地,充分揭批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一 机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主要表现

机会主义的原意是指19世纪中叶法国政治生活中那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意改变政治态度的政党和政客。19世纪8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者借用这个词语,指国际工人运动中背离无产阶级利益、主张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妥协的理论和实践。机会主义有“左”右两种倾向,其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带来重大影响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主要

收稿日期:2013-06-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初步建构研究”(11FSK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初步建构研究”(09YJA710020)

作者简介:刘英(1973-),女,湖南娄底人,湖南工业大学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表现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张东荪假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

在哲学方面,伯恩斯坦鼓吹“回到康德那里去!”以新康德主义的唯心史观和庸俗进化论为武器,攻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伯恩斯坦指责马克思、恩格斯过分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忽视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认为“经济势力以外的其他各种势力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越大,所谓历史必然性这种东西的支配亦随之而愈益发生变化。”^{[1]14}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学说。他否认事物发展中的飞跃,以此否定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企图论证改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确信,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了什么的,今天我还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写着。”^{[1]4-5}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斯坦竭力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论,说这是“基于假设的公式”。反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学说,认为卡特尔等垄断组织具有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作用,并且可以限制经济危机的发生。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财富不断增加,也会产生避免危机的作用。^{[1]59}他否认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缓和下去的趋势。随着垄断组织的发展,资产阶级的人就会愈来愈多,无产阶级也会愈来愈幸福。^{[1]51}总之,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正在和平转入社会主义。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伯恩斯坦提出了一整套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纲领,来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是“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2]。他大肆颂扬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诬蔑暴力革命是“无谓的牺牲”、是“布郎基主义”。^{[1]28}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恐怖的独裁统治”,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总之,马克思主义

过时了,必须对它进行“批判”。^{[1]18}

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主要表现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机会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基尔特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张东荪大力倡导这种思想,公开宣称:我的“学说是自治的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之一种。这个自治的社会主义是英国最近的新学说。”“我以为近代的改造运动中,以此说最为妥善。”^[3]“现在各种社会主义都有缺点,不过,在我看来,基尔特社会主义比较上最圆满罢了。”^[4]

张东荪所宣称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认为中国无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一是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二是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历史与学说有教训于我们,就是凡有一种主义的政治都是一种阶级的要求”,中国“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经验的教训。在他们阶级意识未(发)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如果在劳动阶级还不成立的情况下,便实行社会主义,只能造成一个“伪劳农革命”,“伪劳农主义万一发生必是纯粹破坏的,绝难转到建设方面”^[5]。

另一方面,张东荪认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现状是患有四种病:“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和“外力病”,“四病”交加的中国,唯一的拯救之路,“就是增加富力”,即发展资本主义。因为“世界的资本主义未消灭一天,则中国一天势必顺着此轨迹而进”,“这事不能我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亦是如此,不愿意亦是如此,乃是一个自然趋势”。张东荪告诫社会主义者,应该认清“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时代”,而是“绅商阶级的时代”,我们应该“让德”^[5],让资本阶级去稳健地发展资本主义。

二 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共产党》月刊创办之初,就已经警惕地注意到防止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这与早期党组织成立的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一开始就主张采用俄国革命的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坚决反对第二国际

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特别是该刊第4号刊登了P生翻译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第1章),这篇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经典作品,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者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但改良派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缺略了抹去了曲解了。”^[6]围绕这个中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理论批判。

一是批判改良主义,特别是议会政策的无知与堕落。“议会政策的手段,是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劳动者要选议员,送到国会或地方议会去,参加立法的机关。这些代表劳动者的议员,可以在国会或地方议会中提出改善劳动状态或抑制资本阶级的法案,务期循序渐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德英美等国社会党多采用这种议会政策作为社会革命的手段。可是理想与事实相反,难以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现社会组织之下资本阶级的势力最大,议员中的议员属于资本阶级的必然占绝大多数,议会中通过法案是用多数表决的;劳动阶级没有金钱运动,得几名议员已不容易了,而今有几名劳动阶级的议员提出来的法案,当然要陷于否决的命运。所以无产阶级的议员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出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这时候就是不唱高调只求贯彻自己阶级的几分之一的主张,非与资产阶级妥协不可,非得资产阶级的同意不可。照这样成立出来的法案,无非哀求资本阶级政府行非驴非马的政策。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7]所以,共产党人“要指出给众人看,所谓议会方法,只是资本家偷盗迪克推多大权的一种手段;议会方法的本意既然完全失却,这方法就可以不保留”^[8]“那些糊涂的社会主义者,要想专在议会里等社会主义底实现,不过徒见其梦想罢了。”^[9]

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家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

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10]所以说,“共产党和议会派不同底要点:是主张阶级战争,不赞成在资本阶级的政府底下讨恩惠”^[11]。鉴于此,周佛海鼓动进步青年:“我底意思,我们总不要怕牺牲,怕流血,拿着修正派(从革命到议会)的哄人自哄的话来主张议会主义。关于这一点也应该‘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地照着共产党(多数派)底直接行动去做。”^[12]

二是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翻身得解放的唯一途径:“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到本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10]。周佛海认为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极为密切,“有无产阶级底专政,然后才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底专政,就一定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了。德国底改造不彻底,就是这个原因。”^[12]所以,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施存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识更加透彻:“无产阶级专政,是完成社会革命的手段,也就是达到共产主义的手段”,“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造成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底唯一手段;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决不能实现。”^[9]

周佛海在《夺取政权》一文中,系统论述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政权的必要性,指出:“我所谓的夺取政权,并不是说用什么议会主义去和有产阶级鬼混,想在政治上分一杯羹,乃是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到有产阶级,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接着,周佛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政治、社会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发,指出:“切不可藐视政治,切不可以为夺取政权,乃是危险政客,我们要结合无产阶级底全体,用革命的手段,来夺取政权,以为改造的第一步。”社会改造亦是如此。要巩固改造的成果,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除,非一时的暴动所能成功的,至少非有比较长期的压制不可,而要行比较长期的压制,非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不可。”^[13]俄国革命的成功,就归功于共产党的劳农专政。

三是揭露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及其领袖们的

无耻行径。《共产党》第3号刊登了一篇《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的文章,文中列举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种种背叛革命的丑恶行径,如考茨基污蔑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妇女国有”,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了共产党万国联工会的大凶手,中等社会的献媚奴才,现在更是明目张胆地倒向资产阶级政党了。凡此“种种,就是从前领袖退步的程度,而并且他们就是将死第二国际的‘理想代表’。他们再要退步到什么样子,可就难以想象了。”因此,第二国际已经沦落成残杀劳动界凶手的组织、资本家代表的组织。“为所有诚实工人所不承认,亦为全体有‘阶级自觉心’的无产阶级,所不齿。第二国际不过是‘苟延残喘’,苦渡无耻的末日罢了!”而第三国际是最有进步工人的万国联工会。这些工人是立志或者推翻资本主义,或者死亡的。文章最后高呼:“第二万国联工会就要可耻地死去了。第二万国联工会与第三万国联工会的战争,是中等社会与无产阶级的战争。中等社会阶级,已经败灭了。无产阶级是力量日增……共产党万国联工会,就是令被压的世界有希望的明星!”^[14]

三 批判张东荪基尔特社会主义,捍卫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共产党》月刊在探讨中国革命纲领问题时,就遭遇到张东荪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此,批判张东荪改良主义,捍卫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成为《共产党》月刊的又一重要使命。

一是批判张东荪的资本主义前途论,主张社会主义。施存统系统论述了主张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理由:“第一,资本主义是带国际性质的,彼是要征服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也同彼一样,也是带国际性质的,也是要征服全世界的。这两种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决不能并存于世界。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翻有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但“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决没有世界的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9]这是我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根本理由。第二,中国无产阶级过着非人的生活,

这是张东荪先生也知道的,可见其非人生活的程度了。要使中国无产阶级脱除非人生活,过人的生活,就必须发展产业,增加物质的生产产品不可。“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产业,非但不能给与无产阶级以‘人的生活’,而且还给与许多非常可拍悲惨于无产阶级;这是欧美产业先进国已经教训我们了的——就是上海等都会地方也已经教训我们了。所以,我们不敢用资本主义来生产,主张用共产主义来生产。”总之,“只有用共产主义才能以很大的速度增加生产产品,也只有用共产主义才能使无产阶级得着‘人的生活’”^[9]。陈独秀也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前途,指出:“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趋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生产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中国无产阶级要翻身得解放,必须“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10]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出发,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纪元前就已有革命发生,什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由最惨酷的专制主义产生出来。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也有,最自由的时代也有,甚至于社会主义的时代也有。中国人有这反对军阀和专制的良知,所以最适宜于消灭资本制度。”^[15]

二是批判张东荪关于中国无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论,主张社会革命。李达指出:“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只说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其实他们不过闭着两双眼睛说说罢了。中国的社会中何以没有阶级呢?‘富者天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这两句话不是说明中国贫富两阶级的悬隔吗?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自古以来就有了。”^[7]工业方面,中国现在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总而言之,“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现在受了产业革命的影响,又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7]陈独秀对张东荪的这个观点也进行了猛烈批判,指出:“有人

说中国没有资本家,我要问中国农工商矿一切生产分配交换方法是资本制度还是共产制度?有人说中国没有劳动者,我要问中国人底衣食住等各生产品是何人造成的?欧美各国的华工又是什么人?有人说中国劳农程度低,不配专政,我要问中国劳农底智识人格比徐世昌梁启超还低几何?”^[16]

三是批判张东荪关于绅缙运动论,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东荪的绅商运动论进行了彻底揭批,指出:绅商运动实在是一钱不值,其结果是真正的平民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多一重压制,多一层掠夺。张东荪鼓吹绅商运动是世界的潮流,是自然的趋势,是社会进化必经的阶段,只可利用,不宜攻击的话语,是是而非,蛊惑人心,必须痛斥。第一,西方代议制民主在中国行不通。想在资本主义中产阶级底下做一个顺民,决没有达到的一天。“我们有句俗语,‘前山老虎要吃人,后山老虎也要吃人’。军阀和绅商阶级比起来,简直就是前山老虎和后山老虎。我们不要以为现在绅缙阶级做的罪恶真比军阀少些呀!”^[17]第二,第三阶级的政治不是自然的趋势,不是不可避免的。“什么‘社会进化的必经阶段’,什么‘自然的趋势’这派话头,在西洋也是那些丧尽良心受中产阶级雇佣或竟他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造出来的。他们用了这些抽象的话头,原想把历史上的实在事迹轻轻地瞒过。但是禁不住历史上明明说著。”^[17]第三,绅商运动在中国决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他们的目的本不想把军阀赶走,只想军阀分一些赃与他们,他们就可万事皆休。结果连以暴易暴的目的都无法达到。“本来是军阀一个为暴,将来欲变成军阀(包括官僚)与绅缙共同为暴。本是一曾掠夺,将来欲变成二层掠夺。所以,我们一方面既断定绅缙运动赶走军阀之必不能成功,一方面又确信绅缙运动之结果是使贫民背上的压力更大,更难翻身”。所以,我们只能是“立刻举行无产阶级的革命”^[17]。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强调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且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这从理论源头上端正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方向,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囿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理论的不成熟,他们在批判机会主义的同时,并没有给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也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更不懂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些缺陷,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丝毫不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纯洁性的光辉形象。

参考文献:

- [1] 伯恩斯坦.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 [2] 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言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181.
- [3] 张东荪. 罗塞尔的“政治理想”[J]. 解放与改造,1919(1):1-3.
- [4] 张东荪. 一个申说[J]. 改造,1921(6):2-5.
- [5] 张东荪. 现在与将来[J]. 改造,1920(4):2-6.
- [6] 列宁. 国家与革命[J]. P. 生,译. 共产党,1921(4):30-35.
- [7] 江春. 社会革命底商榷[J]. 共产党,1920(2):2-9.
- [8] 霍格松. 共产党的出发点[J]. P. 生,译. 共产党,1921(3):17-20.
- [9] C T. 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J]. 共产党,1921(5):9-32.
- [10] 短言[J]. 共产党,1920(1):1-1.
- [11] 短言[J]. 共产党,第4号,1921(4):1-1.
- [12] 无懈. 俄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J]. 共产党,1920(1):2-13.
- [13] 无懈. 夺取政权[J]. 共产党,1921(5):3-9.
- [14] 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J]. 共产党,1921(3):10-17.
- [15] B R Bek. 中国与俄国[J]. 震瀛,译. 共产党,1921(3):24-26.
- [16] 短言[J]. 共产党,1921(3):1-1.
- [17] P 生. 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J]. 共产党,1921(3):7-10.

责任编辑:骆晓会